

北大校史研究

蔡元培的学术观及其大学课程建设思想探析

梁 柱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871)

摘 要: 蔡元培从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宗旨出发, 十分推重理论科学的独特作用, 因而在课程建设上十分重视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的教育。他重在学理的大学课程建设思想, 目的是要通过高素质的教育, 培育全面发展的人才。为此, 他特别强调师资质量对教学的决定作用, 并要着力于培养学生的独立研究能力; 同时又明确把德、智、体、美并列而称之为“四育”, 是培养“健全的人格”所不可偏废的。他积极主张吸收外国先进的科学文化, 同时又要择善而从, 重在消化, 反对简单模仿和全盘欧化的错误倾向。这为课程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思想。

关键词: 蔡元培; 学术观; 课程建设; 中西文化

中图分类号: K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919(2004)03-0132-09

蔡元培一生重视教育, 尤其重视大学教育。他在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 施展了改革我国大学教育的抱负。这是他一生从事文化教育事业的最重要实践, 并取得了重大成就。应当看到, 20世纪初期他对北大的改革是多方面的、全方位的, 但又是始终围绕着“培养人和如何培养人”这一主题展开的。他的革命民主主义立场和许多符合教育自身规律的改革工作, 不仅在当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而且在今天也仍是有意义的。因而, 深入探讨他的学术观及其大学课程建设思想, 对我们也仍有启迪作用。

一

蔡元培的学术观源于他对大学的定位和认识。他鄙弃那种把大学视为“升官发财之阶梯”的陈腐观念, 强调大学的性质是“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指出: “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 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要求学生要“抱定宗旨, 为求学而来”。^{[1](P5)}在这里, 蔡元培确立了学术在大学的至尊地位, 在他看来, 一个学校的声誉,

是同它的学术地位相对应的。

蔡元培从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宗旨出发, 十分推重理论科学的独特作用。他认为: “所谓大学者, 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 造成一毕业生之资格而已也, 实以为是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1](P450)}他对学术这个概念提出自己的见解, 认为“学与术可分为二个名词, 学为学理, 术为应用。各国大学中所有科目: 如工商, 如法律, 如医学, 非但研究学理, 并且讲求适用, 都是术。纯粹的科学哲学, 就是学。学必借术以应用, 术必以学为基本, 两者并进始可”^{[2](P339)}。又说: “文、理, 学也。虽亦有间接之应用, 而治此者以研究真理为目的, 终身以之。所兼营者, 不过教授著述之业, 不出学理范围。法、商、医、工, 术也。直接应用, 治此者虽亦可有永久研究之兴趣, 而及一程度, 不可不服务于社会; 转以服务时之所经验, 促其术之进步。与治学者之极深研究, 不相侔也。”他主张“以学为基本, 术为支干”, 认为二者之间是相辅相成、密切关联的, 因而“不可不求其相应”; 同时, 他又强调“学”重于“术”, 在基础理论和应用科学之间, 他是重“纯粹的科学”研究的。因此他主张在

收稿日期: 2004-02-25

作者简介: 梁 柱(1935—), 男, 福建福州人,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

学校的设置上应有所分工,不必各科兼备。“治学者可谓之‘大学’,治术者可谓之‘高等专门学校’。两者有性质之别,而不必有年限与程度之差。”这些主张,对于扭转当时存在的重术轻学、重工轻理的偏向,加强大学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的教育,都具有积极的意义。民国初年颁行的、由蔡元培主持起草的《大学令》规定:“大学以文理二科为主。须合于左列各款之一,方得名为大学。一,文理二科并设者。二,文科兼法商二科者。三,理科兼医农工三科,或二科一科者。”就是他那些主张的具体化。对于北京大学,蔡元培则致力于把它办成文理科的综合性大学,成为研究学理的中心。从上述观点出发,他对北大的学科设置进行了调整和改革。改革后的北京大学实际上成为一所以文、理科为主的综合性大学。

蔡元培考察了科学演变的历史及其发展趋势,看到了学科之间互相渗透和相互交叉的特点,他认为,以前心理学属于哲学,而现在用实验法,应列入理科;地理学的人文方面,应属文科;而地质地文方面则属理科;如此等等。他反对“专己守残之陋见”,主张学科之间互相学习和补充,他指出:“治文学者,恒蔑视科学,而不知近世文学,全以科学为基础;治一国文学者,恒不肯兼涉他国,不知文学之进步亦有资于比较。治自然科学者,局守一门,而不肯稍涉哲学,而不知哲学即科学之归宿,其中如自然哲学一部,尤为科学家所需要;治哲学者,以能读古书为足用,不耐烦于科学之实验,而不知哲学之基础不外科学,即是超然之玄学,亦不能与科学全无关系。”[1](P451)进而他认为,所以存在这种陋见,则和大学文理分科之流弊不无关系。他曾认为这种流弊,即:“文科之史学、文学,均与科学有关,而哲学则全以自然科学为基础,乃文科学生,因与理科隔绝之故,直视自然科学为无用,遂不免流于空疏。理科各学,均与哲学有关,自然哲学,尤为自然科学之归宿,乃理科学生,以与文科隔绝之故,遂视哲学为无用,而陷于机械的世界观。”[1](P672)这些观点是极有见地也是十分深刻的,它对于扩展学生的知识领域,破除“门户之见”,不局守一门之陋习,以及养成良好的学风,都是很有意义的。因此,蔡元培除主张把北大办成文、理科为主的大学外,还提出必须融通

文、理两科的界限。学习文科各门的学生,不可不兼习理科中的某些门,如学习史学的,须兼习地质学,学习哲学的,须兼习生物学等;而学习理科的,不可不兼习文科的某些门,如哲学史、世界史等。

蔡元培对学与术关系的独特见解,使他在课程建设上十分重视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的教育,即他所强调的学理。他对于中小学基础教育(即普通教育)和大学专业教育(即职业教育),都很重视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的教育。他认为基础教育有如房屋的地基,专业教育有如地面上的楼台亭阁;未有地基不牢而能建起高屋的。他不赞同中学实行选科制和文理分科制,就是重视基础知识教育的表现。他强调中学的主要课程,特别是语文和数学两科所学的内容,是学生毕业以后无论学文或是学理都必须具备的基础知识。在大学的专教育中,他同样重视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的学习,强调学生必须具备比较全面的知识。他曾说:“大学宗旨,凡治哲学文学及应用科学者,都要从纯粹科学入手,治纯粹科学者,都要从数学入手,所以各系次序,列数学为第一系。”[2](P182)他主张学生要有扎实而宽厚的基础。1920年北大制定过校旗,旗的右边是横列的红、蓝、黄三色,左边是纵列的白色,又于白色中间缀黑色的北大两篆文,并环一黑色。这是借作科学、哲学、玄学的符号。他对此解释说,红蓝黄三色,象征现象的科学(指物理、化学等)、发生的科学(指历史学、生物进化学等)和系统的科学(指植物、动物、生理学等)。“科学的范围最广,哲学是窄一点,玄学更窄一点儿。就分门研究说,研究科学的人最多,其次哲学,其次玄学。所以校旗上面,红、蓝、黄三色所占的面积最大,白次之,黑又次之。”他以此形象地表明“大学是包容各种学问的机关”,这是他办学的重要指导思想,也是他对学生所应该具备比较宽广的基础知识的要求。由此可见,加强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的教育,即学理的研究,是蔡元培在北大进行课程改革和建设的一个重要原则。

这一时期的北大由于集中了许多学有专长的知名教授,使各学系的课程设置远较过去充实,并且提高了学术水平。在文、法科开设的课程中,如李大钊的《唯物史观》、《史学思想史》,鲁迅的《中国小说史》,钱玄同的《文字学》(声韵),刘复的《语

音学》,吴虞的《文学名著选》,马裕藻的《古籍校读法》,黄节、沈尹默的《诗》,郑奠的《中国文学名著选》,陈寅恪的《佛典译文研究》,林玉堂的《中国比较发音学》,陈翰笙的《欧美通史》,郁达夫的《英国戏剧》,钢和泰的《古印度宗教史》,吴梅、许之衡的《戏曲》,马叙伦的《庄子哲学》,胡适的《中国哲学史》,陈汉章的《中国上古史》,陈启修的《现代政治》,陈大齐的《认识论》,高仁山的《教育学》,张颐的《康德哲学》,屠孝实的《宗教哲学》,樊际昌的《普通心理学》,王星拱的《科学概论》,邓以蛰的《美学》,江绍原的《基督教史》,熊十力的《唯识哲学》,张竞生的《孔德学说》,谭熙鸿的《进化学说》,陶孟和的《教育社会学》,马衡的《金石学》,周览的《国际法》,高一涵的《政治学原理》,顾孟余的《国际公法要论》,马寅初的《货币》、《银行》等,都具有较高的水平,受到同学的欢迎。有的系还对课程安排进行了一些改革,如史学系为了改造旧史学,把社会科学的经济学、政治学等作为史学的基本知识课程。政治系的演习课,也是根据专业需要开设的一门选修课。演习分调查和译书两种,由学生自由选定一种或两种,采取教师和学生共同研究、讨论的方式进行。调查系由学生就理论、历史和现状等方面任选一题目,经指导教师指定参考书和指导研究方法后,自行调查研究,并于一定期间内写出报告,轮流在规定的演习时间上堂解说,再由教师和同学提出质问或批评,最后由教师评定分数。选修学生每学期至少报告一次。译书系由学生一人或两人与教员选译书目,请教师指导译书方法和参考资料,自行翻译,于两个月后轮流上堂报告译作的内容大略,批评其书的长短处,并述翻译中的疑难问题,然后由教师和同学提出质问或批评,最后由教师评定分数。选修学生至少每两月作一次报告。规定调查或译书的成果须交存本系教授会,备演习员和本校师生参考。演习课对培养学生实际工作能力有一定的作用,李大钊、周鲠生、陶孟和、高一涵、王世杰等都担任过这门课的指导教师。政治系还开设《现代政治》课,注意对当前国际国内重大政治问题的研究,讲题由任课教授确定后随时在北大日刊上公布。当时讲授的题目有李大钊的《人种问题》、杨栋林的《现代英国殖民地与其母国之关系》、王世杰的《现

代之出版自由》、高一涵的《苏维埃联合的根本组织法》、燕树棠的《中俄交涉问题》、周览的《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俄罗斯的政治》等。

理科各系的基础理论和专业课程也比过去大为加强。例如,地质学系由于荟集了许多地质学、古生物学方面的知名学者,是北大理科和国内同专业中教授较多的一个系,课程内容比较丰富。其中如李四光的岩石学、高等岩石学、地质测量及地质构造学;何杰的地质学概论、经济地质学、采矿工程学、钢铁专论;王烈的结晶学与矿物学、普通地质学;葛利普的高等地层学、高等古生物学等,都具有较高的水平。这一时期还开设了一些关于中国地质、矿产和古生物的课程,如翁文灏的中国地质、何杰的中国矿产专论和葛利普的中国古生物学等。又如,数学系的必修课程有:近世代数学、近世几何学、函数论、微积分、理论力学、解析几何、微分方程式等。三年级以上选修的课程有:群论、数论、函数通论、集合论、天体力学、流体力学、微分几何学、积分和微分方程式论以及数学史等,课程内容都比较充实。又如,物理系的物理学课程分为初级物理、普通物理和专门物理三级,分别在预科、大学一、二年级和三、四年级进行。其中专门物理课程有颜任光的物理光学、气体中之电流及电子论;何育杰的数理物理、热物学及气体论、原能论;李书华的放射学及X光线;温毓庆的交流电及无线电等。同时还加强了对学生物理实验的指导,颜任光专门编写了学生实验用书《物理实验》。

由于强调基本理论的教育,这一时期北大教师担负的课程任务是比较重的,许多教师对教学和学校的工作也是认真、努力的。如李四光于1920年到北大任教时,他是上午上课,下午教学生做试验,晚上自己做研究工作,星期六下午和星期天则常带学生到野外实习。他的亲属后来曾回忆他在北大任教的情况:“仲揆在北大任教,主课是岩石学。他教书严肃认真,一丝不苟,教材经常补充新的内容。讲一堂课,往往要准备几小时,他对学生要求很严格,学生上课听讲,记的笔记,都要亲自查看。如发现有的学生不理解他所讲的内容,他就把学生留下,单独给他解释,有时因此连吃饭都忘了。学生做毕业论文时,他都要逐个进

行具体指导。学生常常在晚上到家里来请教他,他就和他们边吃饭边讨论。在论文写出初稿后,他要学生自己先反复修改后再由他修改,并指出修改的原因。他认为这样培养学生,可以使学生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进步更快些。”又如物理系教授李书华是1922年到北大任教的,第一年他讲授本科一年级的《普通物理》(包括物性、热学、热力学及音学),每周四小时,同时担任两班实验课,每班每周三小时。第二年除继续讲授一年级的《普通物理》外,并讲授本科二年级的《普通物理》(包括光学和电磁学),每周亦四小时,同时仍担任两班实验课,第三年仍讲授一年级《普通物理》,并加授三、四年级的《近代物理》(包括游子、电子、阳电射、X光与放射学),另外还兼授预科一年级的物理课。他自己曾回忆这时的教学生活,写道:“终日在办公室或实验室工作,一面充实功课内容,一面为学生准备实验室各种实验,同时准备在讲堂讲授时的指示实验。”那时教授们合作得较好,工作是努力的。课程的充实和加强,使学生的学术水平有明显的提高。

二

蔡元培重在学理的大学课程建设思想,目的是要通过高素质的教学,培育全面发展的人才。在这方面,他的许多设想和做法,是值得称道的。

首先,强调师资质量对教学的决定作用,正是由于他重视延聘学有专长的学者,使这时北大课程建设和教学质量都有显著提高。他提出:“延聘教员,不但是求有学问的,还要求于学问上很有研究的兴趣,并能引起学生的研究兴趣的。不但世界的科学取最新的学说,就是我们本国固有的材料,也要用新方法来整理它。”[1](P700—701)这就是他所说的教员要“积学与热心”的标准。他表示延聘教员应向这一标准努力进行。

蔡元培长校后,组织了一个聘任委员会,协助校长聘任教职员。委员以教授为限。规定聘任委员会非校长或其代表人出席不得开会。凡新聘或延聘教授都要经过委员会的审查与投票决定。审核是很严格的,如1922年11月由周作人推荐俄国学者马耶所夫讲授《欧洲哲学史》,经蔡元培同

意提交聘任委员会讨论通过。“因会员均以俄国人只可请讲俄国文学之类;若欧洲文学史等,恐与中国人相去无几也。”[3](P170)未能通过。1918年又由校评议会通过《教员延聘施行细则》,规定第一年为初聘,有效期为一学年,具试用性质,至第二年六月致送续聘书,这才长期有效。过期未送续聘书者,即作为解约。由于重视延聘选拔有真才实学的各方面人才,使北大的教员队伍发生了很大变化。文科方面,集中了许多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代表人物,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吴虞、周作人等。同时也有旧学深沉的黄侃、刘师培、黄节、崔适、屠寄、陈介石、陈汉章等人。此外,文科的马叙伦、陈垣、马裕藻、朱希祖、马衡、陈大齐、刘文典、陈寅恪、顾兆熊、陈衡哲、萧友梅、许之衡、樊际昌、沈兼士、杜国庠、吴承仕、徐悲鸿、徐炳昶、熊十力,法科的马寅初、陶孟和、周览、陈启修、黄右昌、王宠惠、张耀曾等人也都是国内闻名的专家学者。理科方面,知名教授如李四光、颜任光、何杰、翁文灏、钟观光、李书华、夏元璠、秦汾、王仁辅、丁文江、俞同奎、何育杰、胡睿济、冯祖荀、温宗禹、任鸿隽、王尚济,外籍教授葛利普等。这一时期的北京大学,实可谓人才荟萃,学术空气浓厚,盛极一时。蔡元培曾说过,正是由于引进了许多名师和新派人物,才引起学生“求学的兴会”,也才使“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4](P510—511)

其次,重视培养学生的独立研究能力。他指出:“大学的学生并不是熬资格,也不是硬记教员讲义,是在教员指导之下自由的研究学问的。”[1](P700)他要求教员能够引导、启发学生从事研究,反对那种“注水入瓶,注满就算完事”的教学方法。同时,为了培养学生的独立研究能力,他反对学术上专己守残的门户之见。他认为对于治学者来说“最忌的是知道了一派的学说,就奉为金科玉律,以为什么问题都可以照他的说法去解决,其余的学说都可置之不顾了。”这种“守一先生之言,而排斥其他”[1](P451),实际上是旧式书院的恶劣学风。而不同学派的并存,各种学术观点的自由讨论,使学生能够较广泛地接触教员中不同学派的观点,不囿于一己之见、一家之说。“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这样有助于培养学生独立研究

的能力,使他们有可能从不同学派的比较中引出新义,提出自己的创见。所以当时北大教授中就广泛地包含了学术上的不同流派,如史学方面,有信古派的陈汉章、黄侃等,有疑古派的钱玄同、胡适等;经学方面,有今文学派的崔适,有古文学派的刘师培;文学方面,有文言派的黄侃、刘师培、林损等,有白话派的胡适、陈独秀、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等;在文字训诂方面,有章太炎的弟子朱希祖、黄侃、马裕藻,还有其他学派的陈介石、陈汉章、马叙伦;在旧诗方面,同时有主唐诗的沈尹默,尚宋诗的黄节,还有宗汉魏的黄侃,等等。可谓容古、今、新、旧各派于一校。教员中的不同观点也可以唱“对台戏”,如胡适和梁漱溟对孔子的看法不同,蔡元培就请他们各开一课,唱对台戏。王昆仑曾对此回忆说:“蔡先生长北大时,主张百家争鸣,所以会有两位教师唱对台戏的情况,这不仅充分表现了学术民主,而且能启发学生的思路,培养独立思考、探索真理的兴趣与能力。我那时在文科学习,选修文字学。教文字学的有两位老师,一位是新派钱玄同;一位是老派黄侃。我选的是钱玄同的课。一天,我正在课堂听钱老师讲课,不料对面教室里正在讲课的黄侃大声地骂起钱玄同来了。钱听了也满不在乎,照样讲课。后来,我就既听钱玄同的课,也听听黄侃的课,以便两相对照。这种情况并非罕见,它生动地反映当时的北大,在蔡先生的领导下,‘兼容并包’、百家争鸣,学术民主的气氛。”[5]

再次,蔡元培的课程建设思想,并不只是限定在智育的范围内,而是包括德、智、体、美诸育的全面发展。作为民国的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在改革封建教育制度时,就提出以“养成共和健全之人格”作为新的教育方针,并确立以公民道德教育为中坚的国民教育、实利教育、公民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育五项宗旨。后来,他在北大又明确把德、智、体、美并列而称之为“四育”,认为这是培养“健全的人格”所不可偏废的。如前所述,蔡元培是十分重视以基础理论为重点的智育,但他同样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

比如,大力提倡美育,是蔡元培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他认为:“教育的方面,虽也很多;它的内容,不外乎科学和艺术。”[2](P299)“文化进步

的国民,既然实施科学教育,尤要普及美术教育。”

[1](P739)他把美术教育又称作美感教育,激发、陶冶和完美人们的高尚感情,达到美与善的和谐的统一。他曾对美育及其作用作了这样的解释:“人人都有感情,而并非都有伟大而高尚的行为,这是由于感情推动力的薄弱。要转弱而为强,转薄而为厚,有待于陶养。陶养的工具,为美的对象,陶养的作用,叫作美育。”他对学校中实行美育的重视,是因为他认为通过美育可以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即以纯粹的美育,陶冶人们的感情,使之有高尚纯洁的情操。他曾用“超功利”的美学观点,试图说明通过美育能使人达到超脱现实的精神境界,即“提起一种超越利害的兴趣,融合一种划分人我的僻见,保持一种永久平和的心境”[1](P739)。在阶级社会的现实中,这自然只是一种梦幻,但如果脱去这种唯心主义的神秘外衣,那么,具有潜移默化作用的美感教育,却确是能够培养学生高尚的情操,如蔡元培所期望的,不因“见小利,急近功”而“失节堕行”,不因几次挫折而颓废以致厌世,使人具有远大的抱负和进取精神。同时,他认为美育也是促进科学发展的一种原动力。他主张科学与美术并重,认为两者同为新教育之要纲,这就是说,智育和美育(蔡也把美育视作德育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应是相互渗透、相互补充和相互促进的。他曾以“要透彻复杂的真相,应研究科学;要鼓励实行的兴会,应利用美术”[1](P739)来说明科学和艺术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人们具备了上述高尚的思想情操,即健全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就能够有探求的精神,百折不挠的意志。这正如他所说的,“有了美术的兴趣,不但觉得人生很有意义,很有价值;就是治科学的时候,也一定添了勇敢活泼的精神”。他说:“常常看见专治科学,不兼涉美术的人,难免有萧索无聊的状态。”有的人甚至产生厌世的思想,他们“不但对于自己毫无生趣,对于社会毫无爱情;就是对于所治的科学,也不过‘依样画葫芦’,决没有创造精神”[2](P328)。上述蔡元培的美育思想及其在北大的实践,时人曾称他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提倡美感教育的“惟一的中坚人物。”

又如,蔡元培还十分重视体育教育。他认为:“研究学理,必要有一种活泼的精神,不是学古人

‘三年不窥园’的死法能做到的。”[1](P701)他主张通过体育、智育、德育和美育的和谐发展,使生理、身体与心理、精神两方面相协调,来培育学生“健全的人格”。他特别强调:“有健全之身体,始有健全之精神。若身体柔弱,则思想精神何由发达?”[1](P86)他反对把青年学生弄成“书痴相”,反对社会上一些人把所谓“文质彬彬”、“弱不胜衣”看作是“君子风度”的陈腐观念,积极在青年学生中提倡体育锻炼和军事训练。

再者,蔡元培还十分注意把学生的课余兴趣引导到学术研究方面来,发挥第二课堂的作用,以改变过去学生中冶游懒散和追逐仕途利禄的不良风气。他深知倡导学术对纠正社会颓风的作用,认为当时社会“民俗日偷,土风日蔽”的一个原因,是由于“师法堕落,学术消沉”。同时他也深知,要把学生的课余兴趣吸引到学术研究上来,重要的是要启发学生的自动精神,因而他积极鼓励学生组织各种学术研究团体,开展课余学术活动。顾颉刚(余毅)在《悼蔡元培先生》一文曾回忆道:“北大学生本来毫无组织,蔡先生来后,就把每班的班长召来,劝他们每一系成立一个学会。许多班长退下来踌躇道:这件事怎么办呢?因为同学间实在太散漫了。但靠了蔡先生的敦促和领导,以及学校在经费上的帮助,许多会居然组织起来了,不但每系有会,而且书法研究会,画法研究会,音乐会,辩论会,武术会,静坐会……一个个成立起来,谁高兴组织什么会就组织什么会,谁有什么技艺就会被拉进什么技艺的会。平时一个人表现自己能力时很有出风头的嫌疑,可是到了这个时候,虽欲不出风头而不可能了。校中尽有消遣的地方,打牌听戏的兴致也就减少了许多。一夜之内,无论教职员、学生、仆役,都觉得很亲密的,很平等的。”[6](P125)从此,北大学子的课外生活,不但有正当而丰富的文体娱乐活动,而且具有浓厚的学术研究空气。这时北大出现的许多学术性和政治性的研究团体,如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国民社、新潮社、哲学研究会、新闻学研究会、平民教育講演团等等,在校内外都有重要影响,有力地促进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经蔡元培大力提倡,北大学生中学术研究蔚然成风,一些同学结合自己的兴趣,从事著述,发

表见解。如1918年经济系学生李亦轩所著《中国币制统一论》一书,“甚为教授所激赏,且怂恿印行之”。蔡元培应其所请为之作序,称赞“李君此书,有实述以详陈我国币制之现状,有危言以穷其流弊,有刍议以进改良之策。根据学理,胪陈统计,纲举目张,不特足以备当局之参考,即普通人亦不可不读也”[1](P384)。又如政治系学生萧一山,1920年入北大后,致力于清史研究,充分利用北大丰富的史料,并得到李大钊的指导,完成了专著《清代通史》。李大钊为其撰写的序文中,希望他能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把有清一代的历史写成中国国民的历史。作者在该书初版叙例中表示:“近世‘唯物史观’之学说兴起,谓经济之趋势,当求诸历史;历史之变迁,亦根据于经济;二者有相互之关系,而历史之因革,尤以经济为转枢。以盖社会主义之大旨,而以目前的实际生计问题为中心者也。”1923年萧一山的《清代通史》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成为当时史坛的一件盛事,引起轰动。梁启超撰文称赞他“非直识力精越,乃其技术,亦罕见也。”应当说,蔡元培这时大力提倡学术研究,培育了北京大学严谨勤奋、致力学术的学风。

三

蔡元培在课程改革和建设上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就是反对专己守残之陋见,对中西文化要兼收并蓄,择善而从,融会贯通。他在这方面的一些深刻的、精到的见解和做法,是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的。

近代的中国,随着西学东渐,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曾引起了巨大的冲击波。围绕着如何对待西方文明的问题,在政治和思想领域中的斗争是十分激烈的,存在着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妄自尊大,抱残守缺,主张闭关锁国;另一种则是妄自菲薄,崇洋媚外,鼓吹全盘欧化。这虽然表现为完全相反的两个极端,但对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危害则是共同的。蔡元培作为一位革新者,曾实际考察和研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承认“彼俗化之美,乃由于教育普及、科学发达、法律完备、人人于因果律知之

甚明”。他正视我国近代落伍的现实,同时相信这只是暂时的,中国有能力迎头赶上西方先进国家。基于这种认识,在学术上,他既不赞成故步自封的国粹派,也反对消亡本民族特性的全盘欧化论,主张把继承古代文化遗产同广泛学习外国紧密结合起来,通过吸收、消化、创新,求得我国学术的新发展。

首先,他积极主张吸收外国先进的科学文化,并提出大学课程内容要对“世界的科学取最新的成就”。他把善于继承前人成果,学习先进文化,视为人类进化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原因。他认为各民族间互相师法才能有进步和发展,在世界历史上,每一个民族文化的进步,都包含着对其他民族文化的吸收和消化。“人类之消化作用,不惟在物质界,亦在精神界。一人然,民族亦然。”[7](P460)举例说,希腊民族吸收埃及、腓尼基诸国的文明而消化之,创造了灿烂的古希腊文明;高卢、日耳曼诸民族吸收了希腊、罗马和阿拉伯之文化,才有了欧洲今日的文明。中国自汉至宋逐步吸收了印度文明,在哲学、文学及美术方面,“得此而放一异彩”。但自元以来的六百多年间,与欧洲文明虽有接触,然未尝有大量的吸收,只是墨守前人已有的成就,有如冬蛰之动物“日趋羸瘠”。这种历史的回顾和比较是很有说服力的。他批判了那种单纯指摘别人缺点而拒绝学习的妄自尊大的态度:“……社会上一部分之黑暗,何国蔑有?不可以观察未周而为悬断也。”[1](P51)

为了使我国学术尽快赶上西方先进国家,他主张广泛地学习外国的先进文化和先进经验。他说:“吾人为集思广益起见,对于各友邦之文化,无不欢迎。以国体相同,而对于共和先进国之文化,尤所欢迎;以思想之自由,文学美术之优秀,彼此互相接近,而对于共和先进国中之法兰西,更绝对的欢迎。”[1](P349)蔡元培从上述思想出发,在北大广泛容纳西方的新文化、新思潮,允许不同学派的观点自由讨论,使学生通过广泛接触加以比较、吸收和创新。同时,他还把对中西文化兼收并蓄的主张,作为学校课程建设和建设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他在北大,“于英语外,兼提倡法、德、俄、意等国语,及世界语;于旧文学外,兼提倡本国近世文学,及世界新文学”[1](P382);他还“力矫偏重

英语的旧习,增设法、德、俄诸国文学系,即世界语亦列为选科”[4](P511)。理科的一些课程教材亦多采各国的科学新成果,如物理系三四年级的《近代物理》课,内容大部选自居里夫人在巴黎大学讲授的最新材料。

其次,蔡元培认为对外国文化思想应择善而从,重在消化,反对简单模仿和全盘欧化的错误倾向。他在重视学习外国的同时,还十分强调学习时应取的态度和目的。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有精华和糟粕两个部分,学习要择善而从,取分析的态度,为我所需,为我所用。他曾引孔子的话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这就是不守旧、不盲从的态度。现在最要紧的工作,就是择善”。这反映了蔡元培对待文化,包括古代文化和外国文化的正确态度。同时,他还特别强调吸收外国文化应重在消化,吸收是消化的预备,而只有消化才会有益。“消化者,吸收外界适当之食料而制炼之,使物化为本身之分子,以助其发达。”因而消化是以“我”为主体,对于欧美各国的学术文化,“必择其可以消化者而始吸收之”,切忌“浑沦而吞之,致酿成消化不良之疾”[7](P461)。他认为单纯模仿、照搬照抄,只是一种稚拙的举动;而全盘欧化,则是消亡自己民族的特性,同化于他人,是完全错误的。他以高度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责任感,殷切勉励我国留学生应具坚强毅力,发愤图强,“能保我性,则所得于外国之思想、言论、学术吸收而消化之,尽可为‘我’之一部,而不为其所同化”。而切勿志行薄弱,“弃损其我同化于外人”。他语重心长地说:“吾国学生游学他国者,不患其科学程度之不若人,患其模仿太过而消亡其特性。”如若这样,则“留德者为国内增加几辈德人,留法者留英者,为国内增加几辈英人法人”[1](P50)。这些针砭时弊的金石之言,在今天看来也仍不失其价值。

当时这种简单模仿和盲目崇拜外国的倾向,在北大也有严重反映。严复担任北大校长期间,在全校积极推广外语会话,在本科和预科课堂上除一些国学课程外,都用英语讲授。课外活动如开会、讲演、讨论,也多用外语。预科教务会议全讲英语,一些不懂英文的教授有苦难言。这种状况,虽然对推广外语学习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也

助长了盲目崇洋和轻视祖国文化的倾向。特别是当时北大教授中崇拜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留学生较多,他们当中有些人几乎不用汉语讲话,甚至有的教中国历史时也要讲几句英语以显示其有学问。对此,许多人表示不满,连一些外国教员也不以为然,“叹为非兴国之征”。蔡元培长校后,既重视和推广外语教学,又极力矫正这种不良风气。他规定开教务会议一律改用中文。开始时,一个外国教授起而反对,说:“我们不懂中国话。”蔡元培从容回答:“假如我在贵国大学教书,是不是因为我是中国人,开会时你们就都说中国话?”使对方无言以对。从这时起,他明确要求除外国语文课外,其他课程必须使用祖国语言。对《大学理科月刊》刊登的论文,则规定除有关专有名词外,也一律要用中文书写。这些措施受到了进步舆论的赞许。

蔡元培在课程建设上注意吸收欧美各国学术文化的成就,同时又强调结合本国的实际,保存和发扬自己的“特性”。如中国文学系除增加世界文学外,又于中国文学中增加了词曲、小说和小说史方面的课程,并发起征集民间歌谣,供大学生和研究生研究。

再次,蔡元培认为吸收外国文化,不仅要吸收外国文化的成果,更重要的是要掌握先进的科学方法,并运用这种科学方法来整理中国的旧有文化,以创造新义,求得更进一步的发展。蔡元培很重视在吸收、消化基础上的创新,对外来文化是这样,对传统文化亦如此。他曾指出:“研究也者,非徒输入欧化,而必于欧化之中为更进之发明;非徒保存国粹,而必以科学方法,揭国粹之真相。”[1](P450)这种主张反对了故步自封的保守思想,打破了清末以来束缚我国科学文化发展的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谬见,比较正确地指明了对传统文化和外国文化应取的态度。这对于学术研究和学校的课程改革具有指导的意义,当时北大史学系的革新即是一例。

原来,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曾大力提倡新文学,整顿中国文学门(即学系),因而引起旧派教员的不满。1917年秋成立中国史学门时,他们多改归这新学门,想把这里作为他们旧派的阵地。但蔡元培、陈独秀同样重视史学的改革,五四运动后

在中国史学门增设西洋史各课,改称史学系,由原来一国的史学变为世界的史学。蔡元培还将史学系同政治、经济、法律等系一起编入同一学组,表示史学和社会科学的密切关系。为了革新中国旧史学,这时将原为选修课的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课程,改为必修科,作为史学的基本知识课,并且聘请西洋史教授翻译欧美新史学及唯物史观方面的书籍。1920年李大钊任史学系教授后,曾先后讲授过《唯物史观》、《史学思想史》等重要课程。这些措施改变了过去史学门只重史料的偏向,开始重视以科学的方法从事历史的研究。这时的史学界正如李大钊所说,“晚近以来,高等教育机关里的史学教授,几无人不被唯物史观的影响,而热心创造一种社会的新生。”[8](P365)

此外,蔡元培还主张史学必须以科学的依据为基础,要学习欧美新史学的优点。他曾说:“中国的历史人文之学,发达在自然科学未发达之前;西洋的历史人文之学,则发达在自然科学既发达之后。所以他们现在的古学,有其他科学可资凭藉;我们前代的古学,没有其他科学可资凭藉。这件事固可表显我们的前贤创造古学之才长;然亦正指示我们现在从事此项工作者所凭藉之不如人。我们若不扩充我们的凭藉,因以扩充或变易我们的立点和方法,哪里能够使我们的学问随着时代进步呢?”[9](P412)他认为治史学者不仅要重视考古工作,而且和地质学也有密切关系。在他的倡导下,1923年北大考古学会成立,先后进行过多次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如河南新郑、孟津两县出土的周代铜器,洛阳北邙山出土文物,北京宫山明代古迹和甘肃敦煌古迹调查等,这对建立科学的史学和丰富学生的史学知识是很有意义的。

蔡元培在关于融合中西文化的主张中,还提出要开设中外文化相比较的课程。他说:“治一文学者恒不肯兼涉他国,不知文学之进步,亦有资于比较。”[1](P451)这时国文系除开设本国文学、文学史课程外,还开设了外国文学著作选读、外国文学史等课程,以资比较。又如,他认为,“北大旧日的法科,本最离奇,因本国尚无成文之公私法,仍讲外国法,分为三组:一曰德日法,习德文日文的听讲;二曰英美法,习英文的听讲;三曰法国法,

习法文的听讲。我深不以为然,主张授比较法”[4](P511)。蔡元培是我国较早提出比较法学问题的,这对于培养学生分析能力和开阔的知识领域是有好处的。

在上述关于融会中西文化的主张和做法中,蔡元培对继承传统文化和广泛学习外国这样两个关系学术发展的重大问题,都提出了许多很好的见解,特别是他提出对中西文化都要吸收、消化、创新,以求得发展与进步的思想,对当时北大课程建设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对我们今天也仍然是富有启迪意义的。

参考文献:

[1] 蔡元培全集:第3卷[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7.

[2] 蔡元培全集:第4卷[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3] 蔡元培全集:第11卷[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4] 蔡元培全集:第8卷[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5] 蔡元培先生二三事[N].光明日报 1980-02-04.

[6] 蔡元培纪念集[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7] 蔡元培全集:第2卷[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8] 李大钊文集(下)[M].杭州:人民出版社,1984.

[9] 蔡元培全集:第6卷[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Cai Yuanpei's Academic Views and His Thoughts on Curriculum

LIANG Zhu

(School of Marxism,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urpose that college education was for the study of great learning, Mr. Cai Yuanpei had high regard for the unique function of theoretical sciences. So on curriculum he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rudimentary knowledge and basic theory education, aiming at cultivating all-around talents by means of high quality education. Therefore, Mr. Cai Yuanpei highly emphasized the decisive part of teachers' quality and made his effort to train the students to research on their own. At the same time, he defined moral, intellectual, physical and aesthetic education as "four education", which he thought should not be neglected when sound personality was to be formed. Mr. Cai Yuanpei vigorously advocated that we should choose and follow what was good and combat simple copy and wholesale westernization while absorbing advanced science and culture from abroad. And it's also important to assimilate what absorbed. All of these provided important guiding thoughts on curriculum.

Key words: Cai Yuanpei; academic views; curriculum;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责任编辑 何方)